

你们长眠，我们常念

新华社记者追忆扶贫英烈

新华全媒头条

脱贫攻坚战胜利了，1800多名“战士”永远地留在了战场。

清明时节，新华社记者回忆那些印在头脑里的战士面孔，说一些藏在心底的感慨。

你就是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写照

我清楚地记得，余永流是2020年12月1日早晨去世的。当天11点多，我从遵义那边得知消息。

余永流是贵州遵义市汇川区观坝社区的驻村干部。连日加班后，他身体突发不适倒在岗位上。当天下午，我看到了当地干部在他电脑里发现的《呈公主殿下书》。

信落款2018年4月28日，那是余永流请缨驻村不久后，写给未满月女儿的。

信600来字，却是我从没有见过的：不仅是文言文的写法，更是字里行间对孩子的爱、对扶贫的情、对国家的义。

我们依据这封信和他的生平，采写《小“公主”，这封家书爸爸再也沒机会读给你听》，第二天播发后，大量网友留言，有人说，信让人想起《出师表》。

他去世5天后，我到观坝社区采访。说实话，当时还有点忐忑，担心余永流只是因为这封信火。

我走进贫困户家。冯先友说起他儿子查出血液病后，一家生活困难，余永流四处奔走，为他们争取救助，儿子病情有了很大好转。姚国和说，平时看余永流工作很拼，没想到他孩子那么小，“泪奔，一路走好”。

我采访他的同事。他们你一言我一语：余永流带他们去四川帮贫困户孩子上户口、办低保；为了吸引企业投资，他多方联系，还自己画了图纸；五个多月的茄子销售期，他早起到地里督促群众采摘，夜里做销售台账，有时熬通宵。

他的妻子吴学义手机里保存着一段视频。

“我走喽，我走喽，你就在这里玩吧！”

“爸爸——”

乡间小道上，女儿左顾右盼玩耍，余永流开玩笑似地呼唤，女儿抬头，张开双臂扑向爸爸。

“女儿太小，她好像已经把爸爸忘记了，这让我很难过。”吴学义说，“不到6岁的儿子，还记得爸爸，有一次老家有人过世，棺椁停在外面，他非要过去看，说‘爸爸在里面’。”

我觉得，余永流信里写“国之大计”“不辱使命”，不是空话套话，而是他的真心。从他的言行看，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人，有强烈的家国情怀，但也是实干派，他的一生就是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写照。

33岁的余永流、45岁的马勇、56岁的徐先文……身处全国脱贫攻坚主战场的贵州，这些年我采访多名牺牲干部的事迹，他们的忘我奉献深深触动我。没有他们，不会有今日脱贫攻坚成果的取得。斯人已逝，精神永存。(记者李惊亚)

你是我未曾谋面的大凉山兄弟

“又梦到哥哥。梦里看他一身泥，很难过……”4月3日，大雨，我接到蒋茹倩的电话。

她的哥哥蒋富安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后放弃城市工作，回到中国最贫困角落之一的大凉山。2016年8月22日，任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四峨吉村第一书记的他，突然倒下再没醒来，才26岁。

电话勾起回忆，2017年以来我们三次到大凉山采访蒋富安事迹，次次心痛——

四峨吉村在九口峡谷的高山上。我数过，紧邻悬崖的公路连续盘旋50多个弯。这是蒋富安带领村民修的路。2016年前村里只有破旧的土坯房，没公路，没水喝，人也懒散。最难忘原村主任欧其尔吉说，蒋富安的牺牲让村里人惊醒：“全村人都自发打火把下山来，围着哭，哭他走烂三双鞋，哭他好兄弟，哭他不回来……”

他没留下孩子。“他从当第一书记到牺牲，就回了两三次家，一次是火把节，一次是结婚，才一两天就走，和嫂子见不了几面，都是很累的样子。哪有这样的哦？”蒋茹倩说。

没有豪言壮语，没有几张照片，他和凉山州原2072个贫困村的第一书记们，像极了覆盖大凉山的平凡草木。

“本来青岛有好工作，他非要回凉山扶贫，倒赔违约金，助学贷款也没还完，他为什么？”蒋茹倩比哥哥小7岁，2020年大学毕业后，一个人坐班车去四峨吉村找答案。

答案是什么？我问蒋茹倩，她看到，结实的公路通到村组，山头建着水塔，从十几公里外引来清水；老乡赶羊赶牛背土豆，人人都在忙。

“他自夸过，从工作单位州审计局争取到两万斤土豆种子，哥哥帅不帅？”蒋茹倩说，那些种子就是答案，变成了贫瘠大山上的收获，值得！

在蒋家，我见到一个3岁男孩。那是蒋富安去世两年后，蒋妈妈又生下的一个孩子。

“阿爸白天坚强，但晚上都睡不好，梦里经常喊哥哥的名字。”蒋茹倩2019年入了党，她希望当哥哥那样的第一书记，振兴大凉山，延续哥哥的志向。

青春可贵，奉献无价，蒋富安就是我的兄弟，未曾谋面却无比熟悉。我向着凉山方向深深鞠躬。(记者谢佼)

你们要是在就好了

早生的白发、密布的皱纹、朴实的话语……跑过脱贫攻坚的记者，脑子里都有这样的扶贫干部形象。然而从江西修水县采访归来，我最常想起的是两张笑容满溢的面孔。

他们是吴应谱和樊贞子夫妇，在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表彰对象中，他们两人的名字紧紧相连，牺牲时分别为28岁和23岁。



2018年12月16日，人们沿着崎岖狭窄的公路，在下方的水潭中找到他们。那天是他们新婚第40天。

翻看一张张合影，两张笑容满溢的面孔好似两个孩子。他们结婚登记日期选的是“6月1日”。樊贞子送给吴应谱的新婚礼物，是一本用彩笔记录爱恋时刻的纪念册，充满童趣。最后，樊贞子写上“未完待续”。

在吴应谱的农村老家，我看到他的家门前挂着一对印有“囍”字的大红灯笼，旁边贴着白色挽联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被狠狠地刺痛了。

他的同事告诉我，应谱年纪不大，却是独当一面的“扶貧好手”。贫困户古和平是个犟老头，常和村干部“不对付”。吴应谱总是笑嘻嘻地往他家跑，介绍公益岗位，帮助改造土坯房，有时还睡在他家。一天深夜下起暴雨，吴应谱骑上电动车赶往老古家，看到他安然无恙后才放心离开。

老古提起往事，有些酸楚。“过去，我脾气不好，但我知道他是真心为我好。”

我问老古：“既然你对应谱感情这么深，那你还记得他的手机号吗？”

他脱口而出手机号，并说“一辈子不会忘记”。

樊贞子帮扶过的游承自，年近8旬，忘了很多事，却记得贞子牺牲的日子。贞子走后，游承自有一天梦到她喊爷爷，老人答应着从睡梦中醒来，醒来后，泪流满面。

是什么让村民对他们念念不忘？我想，那是因为吴应谱和樊贞子夫妇真正关心着村民的吃穿冷暖，感受着村民的喜怒哀乐，和村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

今年清明，一些人在朋友圈缅怀他们——

“你不是天生的英雄，只是为了让群众过上好日子的普通人，善良爱笑的你说自己很感性，见不得有人这么贫困……要是你在就好了，总能把快乐带给所有人。”

两年过去。脱贫攻坚胜利了，我们笑着往前走，一回头却发现，有的人永远留在了过去。

你们要是在就好了。

(记者赖星)

新华社记者追忆扶贫英烈

了3张年轻的新面孔，他们是主动回村的大学生，想向榜样学习。他们接过文秀的接力棒，踏上崭新征程。我想，文秀知道了，会高兴。

(记者何伟)

你们是守住阵地的战士

我当记者5年多，跑了5年扶贫。

云南曾经的四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，都有倒下的扶贫干部。

倪明真，来自地处滇东北要冲的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。他在海拔2700多米的彝族村寨当了20多年村干部，这里贫困发生率最高时达70%。2017年他被确诊白血病，第一次化疗后，第二天就从医院赶回村，忙着村里发展生态养殖，把土坯房改成砖混房，他自家是全村最后一个完成改造的。2018年7月，我采访他时，他头发基本掉光了，每天早上7点多出门，晚上10点多回家。他当时告诉我：“如果老百姓下一届选我，我还要尽力干好。”没想到，5个月后，他走了。

吴志宏，在滇南的红河州史志办工作27年后，前往红河县三村乡驻村扶贫。在这个哈尼族聚居的贫困乡，他忙着改造危房、解决用水困难、发展产业，顾不上对家人嘘寒问暖，更别提团聚：妻子食用野生菌中毒，他没有回去；驻村近20个月，他几乎没给读大学的儿子打电话，微信交流也很少；与父亲居住的小区一街之隔，但他去世那年只回家两次，见父亲一次。他突发脑溢血那天是10月17日，国家扶贫日，我不会忘记。75岁的吴爸爸说，他觉得儿子没有离开，因为儿子捐献的器官帮助3名器官衰竭者重获新生，2名失明者重见光明。

王秋婷，乌蒙山腹地的昭通市大关县打瓦村驻村工作队员。她2个月遍访22个村民小组，平均每天走2万多步，走烂两双运动鞋。事故发生那一刻，坐在车上的她正跟男朋友通电话，两人本来即将领证。记得我去采访时，她在“双11”给新家添置的床上用品、锅碗瓢盆陆续寄到。

吴国良，当过中学老师、村支部书记，最后一个职务是昆明东川区汤丹镇扶贫工作副主任。他的公务车辆坠下深沟后，我采访他的父亲、弟弟、妻子，后来全家都成了扶贫队员。父亲年近花甲，老党员，说“儿子是他的榜样”，一直在村里干扶贫。妻子原来是镇上普通职工，后来到邻村扶贫。弟弟本在外地工作，吴国良去世后，他也回到东川扶贫，说“完成哥哥未竟的使命”。

我采访过近10位牺牲的扶贫同志，最小的26岁，最大的近60岁，有汉族、彝族、纳西族等。他们大多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，就像一个个战士，守在一个个阵地，必须攻下贫困这个堡垒，哪怕“5+2”“白加黑”，都不会停下脚步。

正是这些战士，通过自己的点点滴滴，积年累月，拉近了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，这不就是初心吗？

我记录他们，是做好记者的本职。同时，我也是作为一个普通人，与他们的身边人相处聊天，安慰帮助。(记者杨静)

你是百姓盼归的燕子

4月3日晚，大源村的驻村干部刘云慧发来信息：村民今天又自发祭奠了诗燕书记，现场让人止不住眼泪。

之所以说“又”，是因为1日已有20多名村民祭奠过他。我打电话过去，刘云慧声音低沉，还在哀伤中。

白天，大源村50多名村民，上至70多岁的老人，下至五六岁的娃娃，带着自家酿的米酒、山上采的杜鹃，汇聚到“燕归路”上，追思湖南炎陵县委书记黄诗燕。

大源村是黄诗燕生前的脱贫帮扶联系村。曾经，大源村人用了17年打下路基，始终还是条乡村土路，晴天一身灰，雨天一身泥。在时任县委书记黄诗燕的大力支持下，这条路2017年硬化成了水泥路。黄诗燕因劳累过度牺牲后，村民为纪念他，将路命名为“燕归路”。

71岁的张艮花蹲在路碑前，慢慢倒上三杯酒，泪水划过脸上的皱纹，“黄书记，我带孙女来看你了。我不会说话，但我们世世代代都会感谢你、记得你。”

村民的讲述，让我想起2019年黄诗燕去世后去采访的情形。

在我国基层党政权力体系中，县委书记责任重大。要做县委书记的报道，挑战比较大，我们也有些惴惴不安。

我当了10年的“三农”记者，与村民打交道比较多。这些村民平时面对镜头都紧张，如果多拍几遍，还会手足无措。但在讲述黄诗燕时，我见到了最生动、最放松、最真切的他们。

有人缓缓讲述、默默流泪，有人娓娓道来、泣不成声，有人刚刚还沉浸在温馨的故事中，下一秒却手捂着脸，痛悔最后一次见黄书记时明明看他脸色不好，手掌冰凉，却没有提醒他去看医生。

采访后，我在房间走来走去，思考：这位县委书记，到底是做了什么，才会让老百姓如此亲近和怀念？

整理笔记，我尝试列出答案：老黄牛、父母官、家里人。

炎陵地处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的罗霄山片区。2011年起9年时间，黄诗燕带着大家把黄桃种植面积从5000亩增加到8.3万亩，4811户贫困户因此稳定脱贫。他不喜欢抛头露面，但为了黄桃销售，屡屡“站台”当推销员，百姓都说“大黄抓小黄，抓出金黄黄”。

2014年，炎陵县有1.49万户住房存在安全隐患，需投入6亿元，而当年全县财政收入仅7亿元。黄诗燕发“狠话”拍板：砸锅卖铁，也要让老百姓住上新房！

易地搬迁贫困户张连军说：“黄书记3年来我家19次，怕我们搬下山不习惯，还给每家配备杂房和菜地，什么事都给老百姓考虑到，真的比亲人还亲。”

他叫诗燕，也如燕子衔泥般垒起了老百姓的“幸福窝”。他去世后，老百姓对他自发的悼念，让我深切理解了“政声人去后”的含义。

不止黄诗燕，脱贫攻坚的“一线指挥官”县委书记群体里还倒下了姜仕坤、泽小勇、蒙汉……老百姓会记得他。

(记者周楠)

扶贫英烈已化身青山绿水，我们能做的就是经常想念，接续奋斗。

(执笔：熊争艳、屈婷)新华社北京4月5日电